



析蒙古诸王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

尹 雁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藏传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其内部宗派林立。蒙元时期,出于对藏传佛教的政治需要,诸王与各派之间建立了供养关系,其关系的建立与实质对蒙元帝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蒙元帝国宗教政策的变化。

关键词 藏传佛教 蒙古诸王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1)03-0019-05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也是蒙元以前吐蕃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中土相继传入,在继承了佛教的大部分教义经典,并吸收吐蕃原始宗教——苯教的基础上形成。赤松德赞统治时期,迎请高僧,译经度僧,继续宣扬佛教,“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1](P29)}吐蕃王朝对佛教的极端保护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也损害到一部分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赞普即位后,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他先是取消了保护佛教的一切法令,继而剥夺了寺院和僧侣的财产,毁灭了三宝。朗达玛灭佛,最终导致了吐蕃王朝的覆灭。此后百年,吐蕃政局动荡,地方势力割据称雄,佛教迎来了复兴的契机。自此,以“朗达玛灭佛”为界,藏传佛教的发展被分为前弘期(公元

7世纪松赞干布统治起至9世纪)和后弘期(公元10世纪起)两个阶段。在后弘期,尤其是公元11世纪,藏传佛教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吐蕃国内政治统治分崩离析,各封建领主之间互不统属,随着经济势力的增强,为攫取更多的权益,他们争战不休,这就使得依附于不同领主集团的喇嘛们之间,出现了门户之见。为维护各自效劳的领主,矛盾日渐明朗化。再者,入藏传法的僧人,来源不一,法派各异,有河西、于阗等地的,有来自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他们秉承的教义、佛典也有很大不同。而且,西藏僧人学佛译经,收徒传法,各有门庭。这些不同的流派和宗门,“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2](P114)}归附者日益众多,藏传佛教内部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系,先后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觉域派等,其中噶举派又分出香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尹雁,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学研究。



巴噶举、噶玛噶举、帕竹噶举、蔡巴噶举、止贡噶举、达隆噶举等几个支派。这些教派都拥有各自的法主、寺院,信奉不同的教义佛典。它们根据某种政治或宗教的需要,随地名、祖师名或某一宗教学者名而命名自己的宗派。甚至,许多教派的创始者,就是出身于旧贵族而依附于新领主的僧人,或本人就是领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萨迦昆氏等,于是,吐蕃国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僧俗合一制度。

13世纪,当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高原,进而摧枯拉朽般西征中亚诸国,伐金、灭夏时,吐蕃国内仍然教派林立,政令不一,但蒙古军的威名早已传遍雪域高原。吐蕃封建领主和寺院集团已经意识到,地势的险峻阻挡不了蒙古军征战的步伐。为巩固或扩大自己的利益,各教派分别派出使者与蒙古诸王联系,力图得到他们的扶持,得以继续在吐蕃或更大范围内设道布教,弘扬佛法。这使信仰萨满教的蒙古王室开始接触到了藏传佛教各派,并确实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很大的支持。

成吉思汗与萨迦派 萨迦派创立于11世纪,始祖是昆·衮乔杰布(1034—1102),他博通显密,声名远播。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最宏传者为萨迦派,方转轮大王成吉思汗兵威及藏地,遂统一阿里三围,卫藏四部,多康三冈,遣使入藏,原贽萨勤庆喜藏,缔结施供之缘,尔后又来召迎彼至蒙古,曾请得佛像经塔而去,仗此之故,蒙人乃敬信佛法,供养三宝,亦曾受持勒策等戒,是为佛法传入之嚆矢。”指出成吉思汗曾经到过藏区并迎请了佛法。《蒙古黄金史》也记载:“有洪福的圣主成吉思汗信奉的喇嘛为萨迦贡噶宁布。依照这个喇嘛的法旨,离额尔斯巴城北门二拉伯处建筑‘达赖·达古里斯贵’寺”。即在凉州城建立了普觉大海寺。并“从遥远处认贡噶宁布为上师,免除了所有藏人的差税,给卫藏的三佛田和僧伽行供养,成

为佛教的施主法王”。^{[3](P771)}说明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渊源深厚。但《多桑蒙古史》中说,公元1223年春,成吉思汗停止西征,决定取道印度、吐蕃回蒙古,“欲取道士番而进,行数日,因所经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布,难于通行,遂返富楼沙,改循前赴波斯之来路退军”。这里讲的是由于吐蕃地理形势复杂,成吉思汗无法经吐蕃返回蒙古,当然就更不能进入吐蕃,并与贡噶宁布喇嘛联系了。这样,关于成吉思汗与萨迦派联系的史料记载产生了很多出入,甚至矛盾的地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由于后来萨迦派在藏传佛教中地位独尊,为进一步得到其他教派和元政府的认可,就与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联系了起来。另在《蒙藏佛教史》中记载:太祖成吉思汗时,曾礼聘西藏萨迦派喇嘛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宣扬佛法。该喇嘛取道河西,路经甘肃,沿途盛传教旨,广事弘扬。到达兰州时,坐化圆寂。陇中佛教,从兹日盛。所以可以这么推断,成吉思汗时代,萨迦派与蒙古王室可能确实有过或者试图曾经接触或联系过。

阔端与噶当派 噶当派的创立者是仲敦(1005—1064),教义授自印度阿底峡尊者。公元1235年,窝阔台合罕封次子阔端于西夏故地,与吐蕃界邻。公元1239年秋,阔端驻军凉州时,派手下大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入藏,在藏北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几百名僧众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赛敦的佛教法师。不过,当时介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隶属于噶举派的达隆寺,却幸免于难。从后来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噶当)派为大”^{[4](P88)}中可以看出,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噶当派僧人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也许因此原因,这个教派没有派人与蒙古诸王联系。所以不仅是因为僧人的武装反抗,还是因为这个教派没



有蒙古王室做靠山,才遭到了打击,并且终蒙元一代,噶当派没有得到过蒙古王室的任何赐封,这在设帝师、尊西僧的元朝是不可想象的。

阔端与萨迦派 蒙古与吐蕃发生正式联系是在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1229—1241),第一个和西藏发生政治联系的是皇子阔端。窝阔台即位后,发兵进攻南宋,命阔端统领西路军进攻四川。阔端颇具军事才能,迅速攻取了河西地区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州)等地。河西地区有若干吐蕃部落居住,为招降这些部落,阔端对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并封吐蕃首领赵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在此立城堡,课耕桑。随着对吐蕃社会的了解,更由于萨迦法主班智达的学富五明、德高望重,阔端决定邀请其来凉州会晤。公元1246年,经过艰辛跋涉,萨班到达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班正式会晤。经过谈判,双方议定了归附条款,萨班致书吐蕃各地僧俗首领,宣扬了蒙古对吐蕃地区的初步统治政策,蒙古王室认可了萨迦派在吐蕃政教各界的领导地位,自此,吐蕃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社会。

蒙哥与噶玛噶举派 噶举派创立于公元11世纪中叶,教义以“大印”和“拙火定”为主,支系众多,有“四大八小”之称,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和帕竹噶举等四个支派,其中帕竹噶举又衍生出止贡、达隆、主巴、雅桑、超浦、玛仓、叶巴、修赛八系。噶玛噶举是其中的一派,也是藏传佛教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公元13世纪中期,首领噶玛拔希“神通广大”,成为一代佛教大师,他曾前往西夏故地,灵州(今宁夏灵武)、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传法,名声远播,在河西地区影响较大。公元1256年,噶玛拔希受到蒙哥汗廷的邀请,据藏文史籍介绍,当时蒙哥汗派出了许多金字使者前来迎请,他应邀前往,讲解四身灌顶,使蒙哥汗

产生善体验、发菩提心,被“汗王奉为顶饰”,^[5] (P81)成为蒙哥的应供喇嘛,获得大量布施,在汗廷驻地哈喇和林建造大寺。蒙哥汗除赐给他金印、无数珍宝外,又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于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从此开始。噶玛拔希是藏传佛教名僧,德高望重,在教派林立、萨迦派已从蒙古王室那里获得特殊地位的时候,为寻求本教派的发展,他努力弘法,并期望得到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宠信。蒙哥汗逝世后,他又投靠了阿里不哥。之所以这样做,按照蒙古守灶旧俗,身为拖雷幼子的阿里不哥即位为蒙古大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噶玛拔希的预料,阿里不哥的政敌忽必烈继承帝位,噶玛拔希遭到了冷遇,自此后该教派深受打击,一直到元朝末年,萨迦派势力衰微,元顺帝宠信噶举派的时候才得以振兴。

忽必烈与蔡巴派 公元12世纪后期,蔡巴·尊追扎在蔡谿卡建立蔡巴寺,蔡巴派因此得名。传说尊追扎学习密法,“其纯善事业,如大白伞盖,周遍映蔽”,^{[6](P72)}归附者众。历代法主皆有成就,公元13世纪时,蔡巴派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据《西藏王臣记》载,忽必烈起初尊崇蔡巴,曾奉蔡巴派为供养之师。尽管他后来转崇萨迦,但在他即位成为大汗,划封卫藏13万户时,仍命当时的蔡巴寺主桑结欧成为万户长。桑结欧珠子本·仁坚任寺主时,赴大都朝贡,忽必烈又赐予其“晓谕百姓之诏书,令其统领机雪上下部、堆隆、扎多、琼布、杰门、以及艾、达、涅三区等修缮寺庙之属民”。对蔡巴派的尊崇之意并不见少,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与蔡巴噶举在卫藏的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蔡巴派积极灵活地处理与蒙古王室的关系是它继续保持发展的重要原因。

旭烈兀与止贡派 止贡派是帕竹噶举的一个分支,公元12世纪义敦贡布创立,教义授自帕木竹巴。传至杰瓦仁布齐,悟一切法皆平



等性,成为学问德行卓绝之人。他曾以法衣裹身,避过雷劈之难,“神力威名盛极一时”,^{[6](P84)}被尊称为杰瓦托杜巴,即制雷菩萨。藏文史书记载:杰瓦托杜巴主持法座时,僧格岭·谛热胡地和亚泽王诸小邦的王侯均遣使来献无量供品,财物丰厚。蒙古王子旭烈兀闻其大名,三次从阿里带来大批馈赠。蒙哥汗时,旭烈兀在波斯故地建立了自己的封地,即以后的伊儿汗国,从地理位置看,旭烈兀的封地距离吐蕃较近。在此,虽不能完全排除帕竹噶举派为寻求蒙元皇室的诰封或庇护,主动联系封地距离吐蕃不远的旭烈兀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该派确实受到了旭烈兀的供养。这可从“止贡寺变”可以看出。藏文史籍载:公元1290年,止贡和萨迦发生冲突,当时伊尔汗国在堆霍(即阿里贡塘)一带有驻军,被称为阿里蒙古军。止贡联合堆霍共同进攻萨迦,止贡官巴贡多仁钦就是带领伊尔汗国的9万军队攻打萨迦的。

忽必烈与萨迦派 忽必烈与萨迦派渊源深厚,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终元一代。蒙哥汗即位后,派忽必烈继续攻宋。公元1251年,忽必烈从河西地区进发,驻军六盘山,萨迦法主班智达时在凉州。忽必烈遂邀请萨班前来六盘山会晤,后者以年迈为由,没有亲自前往,派侄子八思巴前往六盘山与忽必烈相见。此时八思巴虽然年轻,但为忽必烈解答了许多别人未能解答的疑难问题,双方相谈甚欢,此后八思巴便留驻在忽必烈身边。公元1252年,噶玛拔希在河西传教,影响甚大,忽必烈邀请他来相会并挽留他在身边,但被噶玛拔希拒绝。从此,忽必烈便一心供养萨迦派,并给予了大量扶持。他即位后,奉八思巴为帝师,统掌天下释教,萨迦派凌驾于其他藏传佛教各派之上,势力达到鼎盛。不仅如此,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诸帝,也奉萨迦法主为帝师,从政治上极力保护。

妥欢帖木儿与噶举派 妥欢帖木儿即元

顺帝,他在位时,元帝国已经衰落,此时,由于内争纷乱,萨迦派在吐蕃失去了往日的特权与势力,噶举派成为元帝在藏区的代言人。公元1260年,噶玛噶举派四世活佛若比多吉来到元大都,受到了顺帝妥欢帖木儿的热烈欢迎,并给顺帝受戒。妥欢帖木儿赐给若比多吉“万户所需之圆形银印两枚,除开万户属民承担驿站塘讯的差徭之需外,一切差税减半”。^{[5](P151)}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若比多吉在汉地大修寺院,从而加速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综观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经历了一个由主动利用到逐渐信仰的过程。史书记载,蒙古人早期信仰萨满教,尊重萨满巫师,即被称为“珊蛮”的人。珊蛮们身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生于一身,宣扬自己是从天上派到人间的神灵。他们的身份,类似于佛教中的僧侣。说明蒙古民族信教的传统古已有之。蒙古人最早接触的佛教是回鹘佛教。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曾经从乃蛮部塔阳罕那里得到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古文字。另外,他还负责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法令。既然回鹘人从传说时代就信仰佛教,在这里不能排除塔塔统阿也是一个佛教徒,蒙古人接触佛教也许就开始于此。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民族经历了分散、统一最终成为一个亚欧大帝国的过程,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在长期的征战中,成吉思汗意识到了宗教的力量。西征花剌子模时,蒙古军行进到匝儿讷黑镇,镇民皆避入堡,受到堡中守卒的胁迫。成吉思汗派遣答失蛮去劝说他们投降,“答失蛮呼曰:我木速蛮(木速蛮即为回教徒)亦木速蛮之子,奉成吉思汗命,来拯汝等于深渊中。汗率大军距此不远,汝等若稍抵抗,霎时堡垒屋舍将平,血淹田亩矣,降则身家得保。居民感悟,遣代表奉馈礼赴汗营。”^[7]
(196)此处的匝儿讷黑镇民皆信仰回教,当他们看



到在蒙古军队里并不排斥回教徒,而且财产还可得以保全时,立即表示了归顺。这让成吉思汗看到了宗教的力量。因此后来他有训令“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对各教之人要待遇平等”。他还宣布各宗派的教师、教士等,悉皆豁免赋役。他的后世诸王深记在心,并严格按照成吉思汗的训示行事。在对待吐蕃问题上,起初的蒙古诸王应该都是严格执行这一国策的,尤其是当阔端了解到藏族社会的情况,即多达那波所说的“边徼藏地,叢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4](P62)}注意到了佛教在吐蕃地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高原地势,“因其俗而柔其人”,从宗教方面对吐蕃地区实现了征服。

藏传佛教自身的强大和发展,对蒙古诸王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声势显赫的蒙古军队,藏传佛教各派法主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措施。公元1239年,早在萨班与阔端“凉州会见”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纷纷派代表到蒙古地区去,给自己寻找靠山。据史书记载,薛禅汗初崇蔡巴,后又改崇萨迦巴,旭烈兀初崇止贡,后改崇帕木竹巴。阿里布哥初崇达隆巴,后来又改崇噶举派中的迦玛巴。蒙古诸王划分众蕃为己领属,并以之奉献于受供尚师。当然,藏传佛教确实有突出于其他宗教的地方。传说曾云,阔端邀请萨班来凉州前,患龙君病,无人能治愈,后有人说萨班是精通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明、工巧明)之神圣喇嘛,能够医治阔端,故迎请萨班。萨班到后,以狮子吼菩萨之仪轨让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自此以后阔端善待佛教,这也许是萨班第一次在阔端面前显示新宗教的仪式和难解的咒文,使得阔端从这些咒术里看到了他觉得可怕的神秘力量而对藏传佛教生发出来敬畏之心。据《蒙古政教史》载:噶玛拔希和八思巴曾经在忽必烈面前斗法,噶玛拔希示现空中跏趺,穿山岩等神通。八思巴则现断自

身肢体为五段,各自转成五佛,尔后,复原为己身等神变。这些虽只是传说,但却反映了藏传佛教的神秘和威力,对于迷信神秘力量的蒙古人来说,增加了对藏传佛教的畏惧,并因畏惧而逐步产生了信仰。

忽必烈时代,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质的变化。六盘山会晤后,八思巴留驻忽必烈身边,不久,王妃察必接受了灌顶,并对忽必烈说“灌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忽必烈遂请求之。在八思巴接受比丘戒期间,“汗王在二十五名可授戒之翁则三次授戒之时,接受了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后,仿照西夏国体制,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听法和人少的时候,八思巴坐上座,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忽必烈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也就是说,吐蕃一切事宜,尽归八思巴掌握。不仅如此,忽必烈还下达了优礼僧人的诏书,言“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朕告天祝祷。并已颁发圣旨使彼等收执。僧人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所有之地、河流和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迫售卖。”从这些可以说明,忽必烈已完全放弃了其祖父成吉思汗不得偏重任何宗教的训示,正式皈依佛教。此后,终元所有帝王都奉西僧,任命帝师,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当然,为了自身的生存,吐蕃各教派都曾主动派人向蒙古统治集团表示过姿态,寻找支持者,尽管结果各异,关系亲密的程度不同,所得到的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但各教派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些都对蒙元政府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后来元朝历代帝王都成为佞佛之君,信仰佛教,



五台山隆重推出“681”秋冬旅游项目

高峰毅 焦瑾琦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山西 五台山 035515)

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五台山第二届国际文化旅游月闭幕后,五台山向海内外隆重推出“681”秋冬旅游项目,即六项特色旅游活动、八大佛事活动、一个佛俗民情年,以推动五台山的秋冬旅游活动持续不断,好戏连台。

六项特色旅游活动:镇海松涛聆听游、秋冬美景摄影游、生态园林采摘游、金色五台观赏游、银色世界踏雪游、民俗风情体验游。

八大佛事活动:农历七月十五(公历8月14日)的盂兰盆会、农历七月二十四(公历8月23日)的龙树菩萨圣诞法会、农历七月二十九(公历8月28日)的地藏菩萨圣诞法会、农历八月二十二(公历9月19日)的燃灯佛圣诞法会、农历九月十九(公历10月15日)的观世音菩萨出家

纪念法会、农历九月二十九(公历10月25日)的药师琉璃光佛圣诞法会、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1日)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农历十二月初八(公历2012年1月1日)的释迦牟尼佛成道法会。

一个佛俗民情年:在农历腊月十八至2012年正月十八(公历2012年1月11日至2月9日)期间,抓住春节黄金周契机,以家庭宾馆为依托,举办除夕住民宅、贴窗花、包饺子;初一点头香、撞头钟,与寺庙僧人一起过大年,赏第一缕曙光;初二请财神、放“禄马”;初八会八仙,十五闹元宵等一系列特色性、趣味性、游客参与性强的佛俗民情活动。

尤其偏重“西僧”,与藏传佛教各派的积极态度应该是有关系的。

蒙古帝国早期的宗教政策及藏传佛教自身具有的特性和各派法主采取的灵活措施,促成了蒙古诸王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供养关系,并最终导致了元帝国宗教政策的根本变化,即从“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到“尊西僧为帝师”。从此,佛教成为蒙古民族的重要信仰。

参考文献:

[1] 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M].北

京:民族出版社,2000.

[2] 刘立千.印藏佛教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4] 五世达赖罗桑喜措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5]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庄莫、周润年译.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6] 绛求坚赞著,赞拉·阿旺、余万治译.朗氏宗族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7] 冯承钧.多桑蒙古史(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